

语言规划 的 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NGUAGE PLANNING

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 编

 语文出版社

语言规划

的

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NGUAGE PLANNING

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 编

编委会成员名单

(按音序排列)

陈章太 戴红亮 郭龙生

李宇明 谢俊英 姚喜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
语言研究室编.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9

ISBN 7-80184-661-3/H·56

I. 语… II. 教… III. ①社会语言学-文集②语言规
划-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9475 号

YUYAN GUIHUA DE LILUN YU SHIJIAN

语 言 规 划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 编

*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E-mail: ywp@yw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890毫米×1240毫米 16开本 42.25印张 1430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9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我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引进并建立社会语言学以来,在社会语言及语言问题、社会语言学基本理论、语言应用与语言规范、语言接触与语言交际、语言与文化、语言变异、领域语言、濒危语言、双语双方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以及学术活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会组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说我国社会语言学已有长足的进步。

这期间共举办全国性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四届,第一届于 1987 年在北京西山举行,内容为综合性的,会后出版论文集《语言·社会·文化》。第二届于 1989 年在南昌和庐山举行,主题为“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会后出版论文集《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第三届于 1992 年在西安举行,主题为“语言与文化”,会后出版论文集《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因为各种原因,12 年以后第四届才于 2004 年在北京举行,主题为“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定名为《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不久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我们原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第五届的主题为“领域语言研究”,第六届为“语言接触与双语双方言”,第七届为“城市社会方言研究”,第八届为“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第九届为“社会语言及社会语言问题调查研究”,第十届为“社会语言学应用研究”,第十一届为“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但愿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如果后面七届研讨会能够顺利举行,那么我有理由相信,我国社会语言学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

第四届研讨会经历了较长时间才举行,这不免让人有些遗憾。但令人欣慰的是,这届研讨会的规模较大,与会者众多,会议内容集中而丰富,学术气氛浓厚,讨论热烈,效果很好,收获较大。我们从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中选取了 111 篇(其中有些论文已在杂志上发表),现在编成这部集子,内容分为“语言规划理论”“语言规范实践”“普通话推广、教学与测试”“社会语言学调查与研究”“领域语言研究及其他”五个部分,另有 15 篇论文提要。全书洋洋数十万字,可谓硕果累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届研讨会以来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语言规划研究的基本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十几年来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和某些不足。在编辑这部论文集的过程中,同行朋友那种对社会语言学的真诚热爱和执着追求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并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决心同朋友们一起,为我国社会语言学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而共同努力!由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所限,这部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敬请作者与读者朋友多多指正!

陈 章 太

2005 年 9 月 14 日

目 录

语言规划理论

论方言岛的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	曹志耘 (1)
社会因素对汉字改革的影响	陈建民 (8)
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	陈章太 (13)
保护方言、防止方言的快速同化	丁崇明 (19)
从语言规划的角度看对外汉语教学	郭龙生 (25)
近 20 年来中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郭 熙 (31)
有关我国语言地位规划的一些思考	侯 敏 (37)
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工作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	胡明扬 (42)
少数民族语言分类指导的语言规划	黄 行 (46)
关于汉字简化“后退”的思考	李先耕 (51)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	刘海涛 (55)
我国新时期的语言规划断想	刘焕辉 (61)
新中国语言规划的若干特色	刘兴策 (67)
论权势话语与语言规范	骆 峰 (72)
谈中国的语言地位规划	马庆株 (77)
教学语言在香港的选择和对国际语言的认识	缪锦安 (84)
中国“英语热”现象和语言规划	盛 超 (88)
语言规划理论研究的五个重要方面	苏金智 (93)
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孙宏开 (100)
近十年来中国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理论与国别研究述评	王 辉 周玉忠 (104)
台湾地区的语文政策及其论争	许长安 (109)
新加坡华族族群认同的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	许小颖 毛力群 (114)
关于语言接受权问题	杨 华 (122)
语言规范与语言生活的多样化	詹伯慧 (126)
关于“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	张 普 (132)
语言规划与汉语方言研究	张振兴 (138)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联邦的语言改革	赵蓉晖 (145)

文字改革与社会革命：以中国和土耳其为例·····	周庆生 (150)
对外汉语与语言规划·····	周小兵 (157)
关于语言规范的几个问题·····	邹韶华 (163)
前殖民地国家针对英语的语言规划·····	左秀兰 (168)

语言规范实践

语言规范、辞书编纂与社会语言生活·····	晁继周 (173)
西双版纳傣语地名规范化的原则及措施·····	戴红亮 (177)
论导游语体特征制约下的导游辞的规范性与得体性·····	韩荔华 (184)
惯用语的变异与规范·····	马启红 (189)
汉语外来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及“译借词”术语系统的规范命名·····	亓 华 (195)
香港书面汉语和标准汉语的同形异义词语	
——香港社会文化与粤语对书面汉语词汇的影响·····	石定栩 朱志瑜 (201)
关于日本所用汉字的汉语“转型”·····	史有为 (209)
语言变异理论基本概念及其规范·····	汪 磊 (217)
信息处理与语文教学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关系·····	王翠叶 (224)
再议“象”与“像”的使用和分工·····	王大新 (228)
试论谚语的变异与规范·····	王海静 (235)
试论俗语中的相似现象与规范·····	温朔斌 (240)
汉语文本中字母词语的使用与规范探讨·····	杨建国 郑泽之 (245)
语体变异与语言规范及词典编纂——以标题语言为例·····	尹世超 (251)
浅谈字母词在中文中的使用·····	于 虹 (258)
简论吴稚晖制定注音字母的指导思想·····	于锦恩 (262)
关于字母词的几个问题——兼评两本字母词词典·····	余桂林 (267)
汉语从英语中借词的方式与规范的基本方向·····	张 彤 (273)

普通话推广、教学与测试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若干标准问题·····	蔡建华 (279)
《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与《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	
词表轻声词条的衔接问题·····	陈 瑶 (283)
新疆语言状况及推普方略研究·····	高莉琴 徐思益 (287)
从 1997 年以来的推普情况看新时期推普方略·····	康 健 (291)
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李宝贵 (299)

新世纪推广普通话“城市战略”的主体应变及对策	李 珉 喻志军 (304)
对外汉语教师的服饰与课堂教学	李彦春 邵力敏 (309)
新词新语和普通话教学	林建平 谢雪梅 (312)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谈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方略	刘艳春 (317)
汉语的地位与传播问题——与英语比较	马 彪 (323)
汉语新词语的生成取向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适用度	沈庶英 (329)
从集宁“方言普通话”使用的三个阶段看普通话的推广	王宇枫 (332)
对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视觉误读现象的考察和分析	杨 洁 (335)
关于广西“夹壮”汉语普通话研究的思考	杨玉国 (340)
听·思·说——试论香港普通话科教师的口语教学	叶竹钧 (345)
关于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方略的若干思考	于根元 (349)
当前推广普通话的三项基本措施	袁钟瑞 (355)
试论华人地区的特有词语	郑 娜 (361)
海南腔普通话的声调错误及正调教学对策	朱运超 (368)
隐喻与汉语第二语言双音词教学	朱志平 (374)

社会语言学调查与研究

方言史研究中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以晋语史为例	陈庆延 (380)
基于田野调查的中国户外标语口号研究	胡范铸 (387)
日本社会中的汉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	胡士云 (393)
近年大学生流行语与校园文化风尚——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流行语为例	黄 涛 (399)
骂语文化信息的宏观透析	江结宝 (405)
儿化词变异和变化的社会调查研究	劲 松 (410)
军营称呼语变异的因素	康家琬 (416)
对社会语言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理解	李如龙 (422)
江西吉安乡村户外标语口号的社会语言学调查	聂桂兰 (428)
沪上校园新词语的构成、来源及结构方式	齐沪扬 邵洪亮 (436)
汉语报刊中的字母词语情况简析	史艳岚 郑泽之 (444)
深圳大学生语言生活现状的调查报告	汤志祥 姜晓月 (450)
吴桥杂技行话研究报告	王海峰 (461)
武汉人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	王志芳 (469)
香港广告语言使用和价值取向的变化, 1990~2004	吴东英 赖颂怡 温卓豪 (476)
进城务工人员语言状况调查与分析	谢俊英 (484)
城市语言的调查方法探讨	邢 欣 (490)

福建东游人名语言特征的时间分布——中国农村语言生活的一项田野调查···	于 芳 (495)
武汉方言古入声字语音变异调查·····	曾祥喜 (503)
姓名与社会变迁——对墓志材料中唐代妇女姓名用字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赵宏勃 (508)
新疆跨民族交际中的语码选择问题·····	周殿生 (513)
媒介接触对维吾尔族汉语方言词使用的影响·····	朱学佳 (519)
谈谈社会语言学术语译名的统一问题·····	祝晓瑾 (527)

领域语言研究及其他

高校专业课课堂教师举例语分析·····	曹沂华 唐 宏 (531)
山西定襄方言的“家”类称呼语·····	范慧琴 (536)
网络聊天和公告版(BBS)的语言特点·····	冯 洲 (542)
湖北自强学堂的外语教育——从己亥年的课程设置与外语大考试卷说起·····	高晓芳 (551)
汉语商品品名的语义特性·····	黄月圆 陈洁光 卫志强 (557)
言语自评现象·····	李胜梅 (563)
课堂教学语言的复现现象·····	李熹明 (570)
从“婆娅”、“依娅”、“朐朐”到“妈妈” ——福建武平岩前方言母亲称谓的转变·····	练春招 (575)
试论狭义语境对广播电视谈话语体的影响·····	娄开阳 (580)
仿拟在流行·····	吕 禾 (584)
略论“数字文明”与网络语言现象 ——计算机网络内外的语言生活与规范刍议·····	曲彦斌 (589)
正本清源，求同存异——从福建冠豸山定音看我国地名读音规范化·····	商伟凡 (593)
从《内经》注释中的通假字问题看语言的社会变体·····	苏春梅 (599)
当前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与网络语言·····	王丕承 (606)
手机短信语言的分类及特点·····	吴 军 (612)
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评价·····	姚喜双 (61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市场供求状况与广告语言·····	於 春 (627)
《新闻会客厅》访谈话语刍议·····	赵 雪 (633)
论职业口语的调查与规范·····	钟文佳 (640)

部分论文提要

国外语言态度研究·····	阿布力米提·巴克 (644)
“裸语”及其文化悖谬·····	陈春艳 (644)

汉字符集信息结构解读与现代汉语语言本体规划·····	陈松泉 (644)
说量词的“两”·····	杜 鹃 (645)
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	冯学锋 (646)
言语交际的隐性规范与言语得体性·····	贾 放 (646)
深圳地名的语言文化特色·····	李 华 (647)
论“新传媒”时代的网络语言传播·····	李 洁 (647)
语码转换与第二语言习得者的交际失误·····	李炜东 胡秀梅 (647)
河北省抚宁县朝鲜族村的语言使用状况和双语教学·····	王远新 (648)
试论地方语言文字立法·····	魏 丹 (648)
绍兴方言否定副词“勿”的语音变异·····	吴子慧 (649)
今日泰国潮人之潮语·····	张双庆 潘家懿 (649)
辞书界面临的挑战、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的策略·····	周洪波 (649)
高职高专职业(专业)口语教学现状及对策·····	邹 斌 (650)

附 录

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姚喜双 (651)
在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王铁琨 (652)
关注语言生活, 面向社会现实需要开展语言研究	
——庆贺教育部语用所建所 20 周年庆典隆重举行、	
祝贺全国第四届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	刘焕辉 (653)
贺 信·····	曲彦斌 (655)
当前语言生活的问题及其对策	
——在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李宇明 (656)
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名单·····	(661)
后 记·····	编 者 (662)

论方言岛的消亡

——以吴徽语区为例

[提要] 本文在对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问题。文章指出方言岛的形成有三种方式:填水成岛、蓄水成岛、隆起成岛,并讨论了移民与方言岛形成的关系。论文考察了方言岛的生态环境,发现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的地区是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最后指出方言岛的消亡有两种方式:渐变式消亡(“融岛”)和突变式消亡(“淹岛”,即语言转用)。

[关键词] 汉语方言 吴徽语 方言岛 语言消亡 移民

一 方言地图的历史变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方言岛是由移民造成的。我国南方地区的历史就是北方汉人不断南迁并与当地越人和其他土著接触、融合的历史。在迁移的初期,移民方言的原始形态往往就是方言岛。当然,如果是大规模的移民,则会发生“蓄水成岛”的现象。可以想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南方都曾经存在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方言岛,构成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方言地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方言岛的语言地图是不断变幻的。曾经是千岛耸立的湖光山色,如今也许已成波澜不惊的水面。而今天一马平川的桑田,以前则很可能回响着推土机排山倒海的轰鸣声。

以浙江旧汤溪县为例,在593个自然村中,明清时代建立的闽籍移民村有48个,赣籍移民村有8个。(曹树基1997: 288)但今天仍使用非吴语的方言岛村,据笔者了解不过十来个。从方言岛最集中的塔石乡来看,据笔者对《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1985)所提供的很不完备的材料的统计,主要在清代由外省外县籍的移民建立的村庄有28个(这个数字只会少不会多,因为有的村未交待建村历史),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村(18个村)今天已经完全放弃母语,改用当地吴语汤溪话,其余三分之一的村(10个村)对外也使用当地吴语,只在村内还保留使用母语。具体情况参看表1。

表1 塔石乡的移民村和方言岛

移民来源	移民村	村数	今方言岛	村数
福建以汀州府为主	周山, 鱼潭, 下鱼潭, 青山庵, 山坑, 岱上, 关山头, 坟岩, 金牛山, 大茗, 白岩, 交椅山, 珊瑚, 张村, (以下畲族) 大坑, 蒙坑口	16	坟岩, 金牛山, 大茗, 白岩, 交椅山, 珊瑚, 张村, 大坑	8
浙江处州遂昌、松阳	塔石, 东岭, 高田, 井上, 桃连, 岭边	6		0
浙江婺州兰溪、义乌	谷口, 上阳, 金台圩, 银岭	4	银岭	1
浙江衢州龙游	西坞	1	西坞	1
安徽安庆	西高坪	1		0
合计		28		10

再来看浙江常山县的情况。曹树基(1997: 291)认为《常山县地名志》(1987)“是目前所见浙江省唯一一部堪称完备的地名资料”,他根据该志整理出了一个“浙江省常山县自然村建村时代与原籍”表。笔者根据《常山县志》(1990: 601),列出今天的方言使用情况,以资比较。由于曹树基所统计的总村数少于实际村数(《常山县地名志》1987: 3作1527个),所以笔者进一步计算出各类村数在总村数

中的百分比。见表2。

表2 常山县的移民村和方言岛

移民村	浙江其他县	江西南丰、上饶	福建邵武、建宁、汀州、泉州	广东嘉应	安徽安庆、徽州	其他省	本地	总村数
清以前	9	38	38	0	26	12	135	258
清代	15	427	83	9	45	4	417	1000
合计	24	465	121	9	71	16	552	1258
百分比	1.91%	36.96%	9.62%	0.72%	5.64%	1.27%	43.88%	
今方言岛	淳安、江山、衢县话	南丰话	福建话	广东话	安庆话	华埠土官话	常山话	总村数
	88	526	50	0	11	7	840	1522
百分比	5.78%	34.56%	3.29%		0.72%	0.46%	55.19%	

曹树基（1997）主要是研究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移民，所以可能没有把当代的建村情况列入表内，例如39个千岛湖库区移民村。不过，即使存在一些误差，还是可以看出，使用常山话的村数从43.88%上升到了55.19%，使用非常山话的村数相应地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南丰话在常山县为第二大方言，其势力与强势方言常山话相比并不过于悬殊，因而几百年来下降不大。如果刨去江西移民村（南丰话村）和39个千岛湖库区移民村（淳安话村），再来统计一下，就得到以下的数字：

移民村：不计来自江西的还有241个村，占总村数（1258个）的19.16%

今方言岛：不计淳安话和南丰话还有117个村，占总村数（1522-39=1483个）的7.89%

常山县这个“移民村：今方言岛”的比例（19.16%：7.89%=1：0.41）很接近上述塔石乡的比例（28：10=1：0.36）。二者的方言岛保存率都在百分之三四十。

二 谁主沉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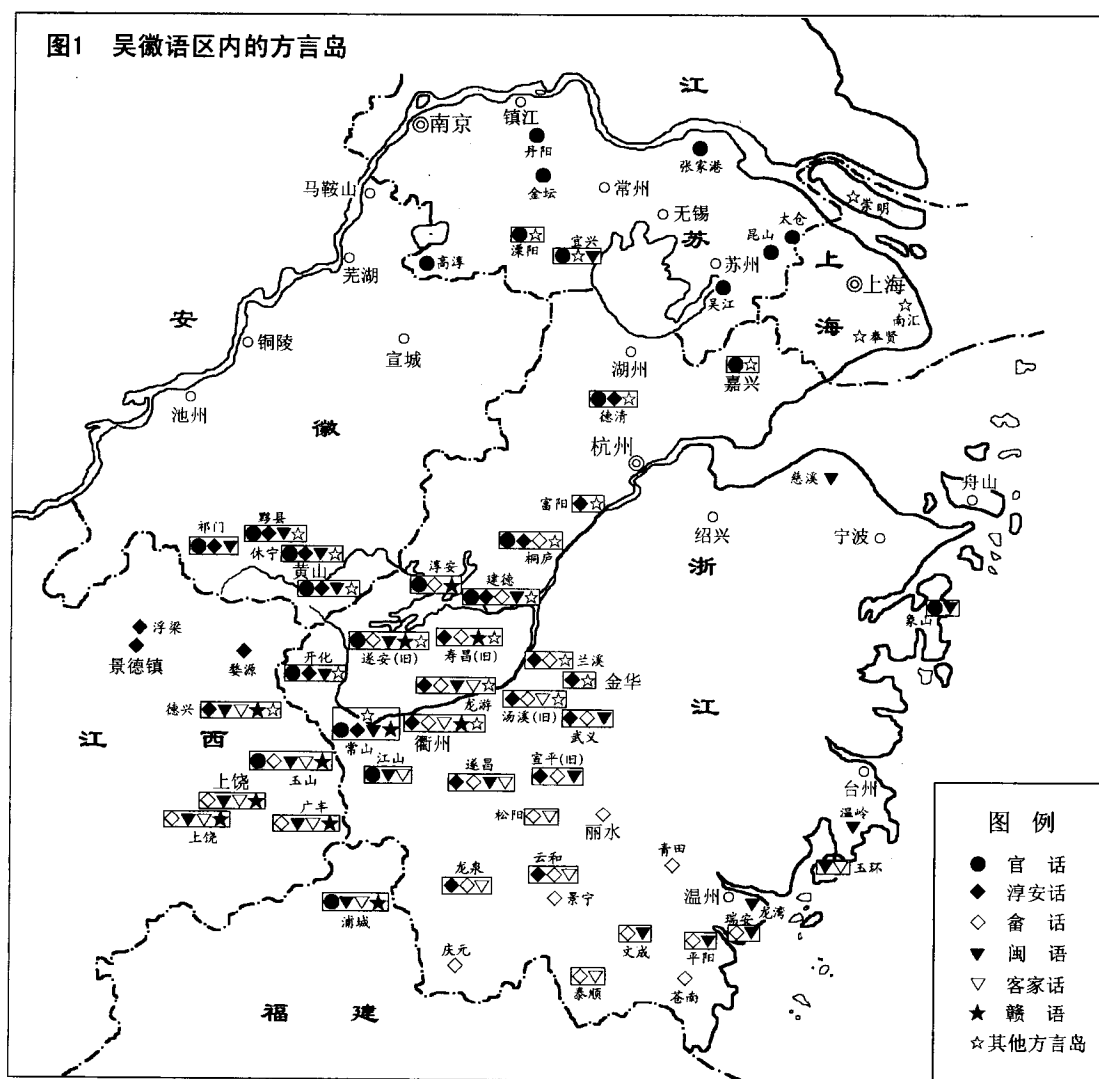
在二三百或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塔石乡境内的方言岛减少了三分之二，常山县境内的方言岛除了南丰话以外也减少了六成。可以想像，在整个吴徽语地区，尤其是那些如今已是“纯吴语”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有多少方言岛此起彼伏，最终都被淹没于吴语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么，方言岛的沉浮究竟取决于什么因素呢？

要回答方言岛为什么会消亡，不妨先来看看为什么能生存。

（一）吴徽语区内方言岛的生态环境

1. 地理交通状况

从整个吴徽语地区来看，现存方言岛主要分布于浙西、浙南、赣东北、福建浦城和皖南等地区；在苏南、上海和浙北地区，除了几处零星的官话、闽语方言岛以外，基本上为吴语所覆盖，而在浙东、浙中地区，则为清一色的吴语，参看图1（曹志耘、黄晓东2004）。从地理交通状况来看，方言岛集中分布的地区均为高山或丘陵地区，长期以来交通条件极为落后。而方言岛较少或无方言岛分布的地区则基本上是平原及沿江、沿海地区，交通便利。



从县一级的情况来看，除了淳安话这种因政府行为造成的方言岛以外，其他方言岛多分布于县境的边缘地区，在县中心地区尤其是县城周围地区则很少见。这也与地理交通状况有关。在浙西南、皖南一带，县城多沿江而建，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地势比较平坦，边缘地区往往是地势较高的崇山峻岭。

再来看塔石乡的情况，移民村几乎遍布全境，然而迄今保存下来的方言岛除了畲族村大坑以外，全都集中在最南端与遂昌县交界的偏僻的高山之中，在北部地势相对平缓、交通相对便利的村庄，移民村的方言都已经本地化了。

在地势高峻、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地区，方言岛与当地强势方言接触的机会较少，易于独立生存和发展。

2. 经济文化水平

吴语北部地区开发很早。由于具有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产丰富、交通便利等天然优势，在上古时代，位于该地区的苏州、绍兴就已经成为一方的政治中心，以后南京、杭州相继成为数代封建王朝的首都，盛极一时。近代以来，上海更发展成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城市。如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上海同时也是全国最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苏州、杭州历来人文荟萃，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而“长三角”基本上就相当于吴语北部地区。

在另一方面,浙西、浙南、皖南、赣东北等地区,则是一番截然不同的风景。山高水险,土地奇缺,道路阻隔,几千年来一直停滞于典型的小农经济状态,衢州、丽水至今仍是浙江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在吴徽语区内,整个南部地区(尤其是西南部地区)与位于北部的长三角地区构成了新旧两重天。

经济发展的快慢,决定了一个地区内部及其与外部交往的程度。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一个地区的人接触和学习外地语言文化的能力。从方言发展变化的角度来说,经济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内部各方言之间、本地方言与外地方言或共同语之间的接触就越频繁。在这种频繁的语言接触过程中,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小方言会逐渐磨损自身的特点,向强势方言趋同,或者干脆放弃自身的方言,转而使用强势方言。在一般情况下,方言岛都属于弱势方言,只要假以时日,它们的消没于强势方言之中,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反之,经济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弱势方言的生命周期自然会比较长。吴语北部地区方言面貌的过于“纯净”,南部地区方言面貌的过于“庞杂”,与各自的经济文化水平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 区内方言异同程度

与地理交通状况、经济文化水平的因素相关,吴语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的内部一致性较强,婺州片、处衢片内部分歧非常大,徽语内部的分歧也很大。在浙江西南部、皖南徽州地区,两个邻县之间,甚至一个县内的不同乡镇之间互相不能通话,这是常事。例如在处州方言(王文胜2004)中,介词“被”有11种说法:乞、担、得、分、吃、拨、让、问、约⁵、等、□[məu⁴⁴⁵]。仅在缙云一县内,就分布着7种不同的说法:壶镇说“得”,三溪、大源说“拨”,新川、双川、新碧、东渡说“问”,舒洪、方溪、大洋说“约⁵”,白竹、东方说“等”,溶江、胡源说“□[məu⁴⁴⁵]”,石笕、木栗说“乞”。

一个地区内各地方言之间的异同程度,会影响到该地区方言岛的命运。内部一致性高,各地方言之间交流便利,易于互相影响和趋同,形成更统一、更强大的方言。而岛外方言势力越大,对方言岛的生存压力也就越大。内部分歧大,中心城市的方言很难制约和同化本地区内的方言,各地方言相对独立自主,各种小方言(包括方言岛)得以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里自由地生存发展,吴语婺州片、处衢片和徽语地区就是这种情况。如上文所述,在吴语处衢片的常山县境内有常山话、南丰话、福建话(可能包括客家话和闽语)、淳安话、江山话、衢县话、安庆话、华埠土官话、九姓渔民方言等十来种方言。又如在徽语严州片的遂安县,不少村庄往往同时有好几种方言并存并用。据笔者调查,安阳乡乌龙村存在衢县、常山、安庆、福建4种方言,黄家源村则存在建德、寿昌、衢县、常山、安庆5种方言。

在今天的吴徽语地区,方言岛种类最多、分布面积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正好就是内部分歧最大的婺州片、处衢片和徽语地区。这决不是偶然的。

(二) 方言岛消亡的原因

由上述吴徽语地区的情况可见,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是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这些因素有一个相同的作用,就是可以使方言岛存在于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空间,或者说相对“真空”的状态中。而这种“真空”的状态一旦被打破,方言岛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融或灭亡之路。下面以珊瑚村客家话方言岛(曹志耘2003)为例,来看看方言岛是如何走上消亡之路的。

如上文所述,珊瑚村由来自福建汀州上杭县古田村的廖文仕于雍正十年(1732年)所建。地处浙江旧汤溪县的最南端,离县城汤溪镇42公里,正好位于汤溪、遂昌、龙游三县同时也是金华、处州、衢州三府的交界处和分水岭上。环境偏僻,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仅有山路与外界相连。现有村民63户,178人,除个别随母亲改嫁时迁入和招赘迁入的外姓户以外,均为廖姓户。长期以来,珊瑚村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与外界交往很少,离得最近的商店在塔石村(旧路相距10公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活动范围一般只限于本村及其附近村庄,有的人连汤溪都没去过。祖辈中没有考取功名或做官的人,如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是文盲,接近60岁的人当中仅有7人读过小学或初中,初等教育在本村完成。语言方面,在珊瑚村内,所有的人都使用珊瑚话,即使是从外地嫁到本村的女子和入赘者也都说珊瑚话。在与外地人交谈时,除了对同属客家话方言岛的邻村交椅山、白岩、大茗等可使用客家话

以外，其他场合均使用对方的方言或普通话。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90年代初，塔石至银岭的公路（汤溪至遂昌公路的一部分）开通。1992年，珊瑚村修建了与汤遂公路连接的简易公路，汽车可直接开到珊瑚村口。与此同时，开始有人外出打工，如今在外地（本省义乌、金华、温州等地）打工的约有40人，基本上是20~40岁的青壮年，约占该年龄段的60~70%。90年代初，珊瑚村小学撤消，现在上小学到山坑村，上初中到塔石村，上高中多到汤溪镇，均需住校。今天的青少年全都上过学。全村现有1名大学毕业生，1名中专毕业生。此外，广播、电视媒体已经普及到户，看电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珊瑚村延续了200多年的“真空”状态被完全打破了。影响到语言上，年轻一代比祖辈们更加积极地学习使用汤溪话、金华话和普通话，其中会说金华话的主要是年轻人。外出打工的男子越来越多地娶回外乡、外县乃至外省的女子，他们与外地女子谈恋爱时，都要迁就女方的语言，在有些家庭中，这种状况会在婚后一直延续下去。嫁到珊瑚村的外地女子，多数只能听懂珊瑚话，但说不好，或不会说。她们不但自己不愿意学习使用珊瑚话，而且不鼓励自己的小孩使用珊瑚话，现在有的小孩跟父亲说珊瑚话，跟母亲说母亲所说的那种外地话。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与说汤溪话的小孩一起学习，共同生活，他们在学校里一律使用汤溪话或普通话，回到村里，特别是跟小朋友在一起时，也常常使用普通话，个别小孩已经不会说珊瑚话了。上述变化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年轻人积极学习和使用外部强势方言；（2）外地嫁入女子坚持使用娘家母语；（3）儿童母语能力严重下降。

今天，尽管客家话仍在珊瑚村通行，但短短十来年的“开放”已经使这个珊瑚小岛受到致命的侵蚀，而这种侵蚀必将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继续下去。也许再过两三代甚至一两代，珊瑚话就要终结其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双语制（对内使用母语，对外使用其他方言）能够保护方言岛的生存吗？笔者以为，答案是否定的。在方言岛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时代，双语制的确可使方言岛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其他方言的侵袭和同化。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今天的方言岛与外部世界全方位地连成了一体，“方言岛的内部”已经无法构成一个独立和封闭的空间，母语在方言岛内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作用。换句话说，母语不仅对外“没用”，对内也逐渐“没用”了。曹志耘（2001：9）指出：“方言消亡的根本原因，是这种方言的‘用途’越来越少，‘作用’越来越小，简而言之，是因为这种方言‘没用’了。”方言岛的消亡也不例外。

珊瑚村的例子使我们看到，弱小方言岛的生存只能依赖于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形态，它们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在当今全国化、全球化的强劲浪潮中，这种方言岛无异于松散的小沙丘，完全不堪一击。这是无奈的现实。

三 方言岛消亡的方式

（一）岛屿的消失方式

在自然界，岛屿的消失主要有两种方式：

1. 融岛：如果是由冰山或沙山构成的岛屿，因气候变暖或海浪的常年冲刷，可能会慢慢地消融于大海之中，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2. 淹岛：当水域的水位大幅上升时，原先露在水面之上的岛屿可能会被水面淹没覆盖，消失于水底。

方言的消亡一般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渐变式是指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包括普通话）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演变，最终与强势方言融为一体。突变式是指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的强大冲击之下，最终放弃弱势方言，改用强势方言。突变式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中间一般会有一个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存并用的双语过渡阶段。（曹志耘1999）方言岛的消亡也不例外。

联系到自然界岛屿的消失现象，渐变式消亡可以看作是“融岛”，突变式消亡可以看作是“淹岛”，

用语言学术语表述就是“语言转用”(语种的替换)。这也与游汝杰(1992: 65~66)方言岛的“消溶”和“消失”两种演变方式相对应。不过,消亡了的方言岛都已无法观察,而能够观察到的方言岛都还没有消亡。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正在走向消亡或已经接近消亡的方言岛,来看看方言岛在消亡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二) 渐变式消亡

如果方言岛与周围方言的接触过于频繁和持久,那么方言岛就可能发生渐变式的消亡。这里以浙江象山县爵溪所里话(曹志耘、黄晓东2004)为例。

爵溪位于象山县城东11公里,三面环山,一面滨海,当海道要冲,为海防要地。为了抗倭,明洪武二年(1369)置爵溪巡检司,二十一年设爵溪千户所,并筑所城。千户所设置之初,驻守官兵多属北方和中原籍,其中河北大名府籍者尤众,所内盛行北方官话。不过,由于经历了长达600多年与当地吴语的接触和相互影响,今天的爵溪所里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吴语化”了。《中国语言地图集》列举了吴语的15条特征,表3显示爵溪所里话与这15条吴语特征的相似度,表中“+”表示有此特征,“-”表示无此特征,“±”表示部分具备此特征。

表3 爵溪所里话与吴语的比较

吴 语 特 征	爵溪所里话
1. 古全浊声母多读浊音, 古塞音三分	+
2. 古疑母今读鼻音, 洪音作[ŋ], 细音作[n]	±
3. 古微母有文白异读, 文读音, 白读鼻音	-
4. 古日母有文白异读, 文读音, 白读鼻音	-
5. [m n ŋ]能自成音节	±个别字
6. “鸟”字声母有[p t]文白两读	+
7. 咸山两摄字一般不带鼻尾	+
8. 蟹摄二等字不带[i]尾	+
9. 咸山两摄见系一二等不同韵二等指白读洪音	-
10. 梗摄二等白读跟同摄三四等及曾摄不混	±个别字
11. “打”读“德冷切”	-
12. 平上去入今一般各分阴阳	+次浊上归阴上
13. 入声多收[ʔ]尾	+
14. 否定词“不”字口语读唇齿音声母	-
15. “个”的轻声表示领有	+

以吴语的15条特征来衡量,爵溪所里话与吴语相同者7条,不同者5条,部分相同部分不同者3条。表明所里话已深受吴语的影响,是吴语化的官话方言岛。近几十年来,爵溪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曾先后被评为浙江省综合经济实力二十强镇、省出口创汇第一镇。经济飞速发展,交通条件大为改观,外来人口大量增加,这一切使所里话这个方言岛迅速向当地吴语靠拢,可以预料,所里话的“吴语化”程度将会不断提高。象山县境内与爵溪千户所同样性质的其他卫所(它们的军民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由沿海迁往内陆,因此与吴语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均已改说吴语,爵溪所里话最终是否也会完全吴语化,可以拭目以待。

如果方言岛的语言面貌与周围方言比较接近,渐变式的消亡就更容易发生。不过,方言岛之所以会成为方言岛,从语言面貌上来说,一般都与周围方言具有显著的区别。因此,尽管方言岛难免与周围方言接触并吸收它们的成分,但由这种途径引起的方言岛向当地强势方言靠拢而最终导致消亡的过程应该

是十分缓慢的。

（三）突变式消亡

语言在比较正常、稳定的生存环境里所发生的变化，通常都是渐变式的。但在生存环境出现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语言也会发生突变式的变化。方言岛的生存环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环境，很容易受到外界社会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与一般方言不同，在方言岛当中，突变式消亡是一种重要的消亡方式。

以九姓渔民方言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后，政府组织散居在江上的九姓渔民上岸定居。这些九姓渔民主要安置在建德县三江沿岸的梅城、三都、大洋三镇专供九姓渔民居住的渔业村和航运社，也有少量分散到其他村里。今梅城渔业村有120多人，三都渔业村有170多人，大洋渔业村有160多人，航运公司（由几个航运社合并而成，集中居住在梅城南门码头）有100多人。九姓渔民以往社会地位卑贱，现在人口很少，而且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属于极端弱势和濒危的方言岛。今天，真正地道的船上话（九姓渔民方言）只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会说。中年人受当地方言建德话影响很大，常常会不自觉地把建德话的成分混入船上话。青少年主要生活在非九姓渔民社会里，他们大多已经说不好船上话了，其中部分人已经完全不会说船上话了，他们只会说建德话。估计再过几年，船上话就会基本消亡，被建德话取代。

畲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具有明显和强烈的独立意识。因此，在畲话方言岛，渐变式消亡的现象似乎很少见，畲话的消亡可能多以突变的方式发生。浙江旧汤溪县塔石乡有一个畲族村叫“大坑”，它有两个自然村：大坑村59人，其中畲族55人；蒙坑口村65人，其中畲族6人（《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1985）。蒙坑口村的畲民已经不说畲话，只说汤溪话了。大坑村老年人还会说畲话，但年轻人会说畲话的也越来越少，部分儿童已经不会说畲话了。在大坑畲话方言岛，发生“语言转用”的现象似乎也在所难免了。汤溪县还有一个畲族村——汤溪镇鸽坞塔村，据《钟氏宗谱》记载：“始祖运来，雍正（1723~1735年）初年由福建武平寨迁此。”全村181人中，畲族有105人（《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1985）。据笔者所知，该村至迟在20世纪上半叶已完全不说畲话，改说汤溪话了。在短短200年的时间里，一个处于吴语区的客家话方言岛以渐变的方式彻底消亡是很困难的，鸽坞塔畲话方言岛应该是突变式消亡的结果。至于大坑村和鸽坞塔村畲话消亡速度的不同，可能是因为前者位于山区深处，后者位于山区和平原的交接处。

附 注

本文研究受“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 曹树基 1997 《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 曹志耘 1997 《浙江的九姓渔民》，《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
- 曹志耘 1999 《二十世纪汉语方言的发展变化——历史和地域的角度》，[日本]《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19期。
- 曹志耘 秋谷裕幸 太田斋 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曹志耘 2001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曹志耘 2002 《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 曹志耘 2003 《浙江金华珊瑚村方言状况》，《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 曹志耘 黄晓东 2004 《吴语区内的方言岛》，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4.6.23~25。
- 常山县地名办公室 1987 《常山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 常山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0 《常山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 黄晓东 2004 《浙江安吉县官话方言岛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金华市地名办公室 1985 《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内部资料。
- 平田昌司主编 1998 《徽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王文胜 2004 《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游汝杰 1992 《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8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曹志耘，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caozy@blcu.edu.cn）

社会因素对汉字改革的影响

[提要] 制定和实施汉字改革的方针政策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全文分为四节: 一、政治层面对海峡两岸汉字使用的影响和制约。文章回顾了国民党 30 年代颁布简体字、50 年代反对大陆推选简化字、八九十年代宣扬“两岸文字应主要统一到台湾正体字上面”等阶段, 指出两岸政治上不统一, 汉字的统一问题就委难解决。二、汉字是废不了的。针对文改的激进意见和观点, 文章指出汉字不应当废除, 也是废除不了的。理由是: 汉字与汉语相适应, 汉字与汉人的思维模式相适应。三、对繁简字的语言态度分析。由于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商贸、经济等联系日益加强, 为靠拢对方, 大陆一些商店、宾馆、公司竞相把招牌、广告、商品说明等改用繁体字。少数领导一则对滥用繁体字的干预有过激之处, 二则把简体字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 导致部分群众产生逆反心理。文章引入“语言适应”的语用原则, 不赞同给使用不当的繁体字贴上“不规范字”标签。汉字简化的方针是正确的, 但简化字里不合理的东西多得很, 只能将错就错, 不宜随便改动。四、结束语。文字的发展相当缓慢。我们考虑汉字发展的前途问题时, 不能超越今天汉字发展阶段, 也不能离开我国的国情、民情。

[关键词] 社会因素 汉字改革 影响

汉字改革是我国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汉字的一种人为的干预。这种干预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来自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政府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制订汉字改革的方针、政策, 并根据改革中不断变化了的情况在适当的时机做出适当的调整。政府是制订和实施汉字改革的主体。另一方面来自文化名人和其他社会名流, 特别是语言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从学术方面加以论证, 提供汉字改革的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 是我国实施汉字改革的重要保证。跟其他语言规划一样, 汉字改革也是依靠学术支撑的政府行为。汉字改革方针、政策的制定与贯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心理因素(包括政治心理、社会态度、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和制约。

一 政治层面对海峡两岸汉字使用的影响和制约

1935 年 8 月 21 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 简体字公布后立刻遭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守旧派的激烈反对。据说戴曾在国民党中央的一次会上突然下跪, 声称为汉字请命, 说什么“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一个字也动不得”。太原、香港等地还出现了反对简体字的团体“存文会”, 要求“勿强制推行简体字”,^①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简体字思潮。1936 年 2 月, 简体字公布仅四个月, 因受保守势力的阻挠, 终于由行政院出面宣布废除。

国民党政府在历史上第一个以政令形式颁布简体字为法定文字, 这确实顺应了历史潮流。1949 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 据说蒋介石仍积极倡导汉字简化, 说:“简体字是生活的需要, 时代的需要。”可是, 随着大陆公布《汉字简化方案》, 积极推行汉字简化后, 台湾竟把海峡两岸文字的使用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 坚持繁体字不动摇, 并且大量发表文章, 诋毁大陆的简化汉字, 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大概出于“汉贼不两立”的强烈的政治考量。那时候, 台湾如有人宣扬汉字简化, 就有可能被扣上“为共党张目”的大帽子, 更不敢公开谈论大陆推行简化字的功过得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台湾正处在所谓“戡乱时期”, 海峡两岸互不接触。80 年代后期, 台湾终止了所谓“戡乱时期”, 抛出一个“国统纲领”, 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作了不少文章, 其策略、手段也有了变化。他们认为, 文字是文化的根, 文化交流必须先解决影响两岸交流和沟通的文字障碍。说什么“40 年来, 中共将中国文字简化、拼音化, 不仅产生文字混乱现象, 也造成中国人沟通的障碍”, “中国的统一要从文字统一开始, 而文字的统一, 就是要促使大陆恢复繁体字的地位。”^②于是, 由袁晓园先生和极少数台湾学者出面, 发起成立“海峡两岸书同文促进会”,^③筹划以繁体字或以繁体字为主统一两